



《燕园困学记》
温儒敏 著
新星出版社

温儒敏随笔集 《燕园困学记》出版

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的随笔集《燕园困学记》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书中既有对数十年来北大人事变迁的叙写，对学界名流轶事传奇的记录，还有文学名著书里书外的趣闻考索。

《燕园困学记》中的回忆性文章分为三辑。一辑“说事”，记录数十年间的北大见闻、学界故记，事虽琐屑，亦可见时代画影，另有几篇论及大学人文教育，如《大学到底有什么用？》、《大学“五病”》等曾广为流传，指斥流弊，评说时事，对教育制度的思考深刻犀利；二辑“写人”，温情记录与吴组缃、王瑶、孟二冬、钱理群、曹文轩、龚鹏程、孔庆东等师友的交往，以不同视角，折射不同人生；三辑“聊书”，以书为话题，或抒发情感，或记录世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温儒敏在北京大学读书、任教，其间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近年参与课改，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制，主编现代文学丛刊，又受聘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都与书脱不了干系。他自称每天都与书为伴，一日无书便浑身不自在，读书已成为他“顽固的生活方式”。

大学到底有什么用？

□温儒敏

大学到底有什么用？提这个问题似乎“很傻”，因为谁都有现成答案。比如，大学就是培养人才，就个人而言，上大学就是为了今后能找一个好的工作等。这些回答都没有错，或者说可以理解，但起码是不完全的。大学肯定要培养各方面人才，但如果办学的目标就限定于此，这可能是短视的、工具性的。钱学森先生临终提问：为何我们的教育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看来的确需要反思。很可能是定位出了问题，用工具性思维来办大学，定位太功利、太实际，只想出人才，反而难于出人才。

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社会转型，国力强大，空前开放，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办学的条件好多了。在新的情势下，我们有条件也应当摆脱过去那种工具性办学思维，进而采用更长远的眼光与胸襟来办学，国家也有这种战略的需求。

为什么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知名的高水平的大学？潜台词就是要按照世界的通例与成功的经验来办大学。本来这是个进步，观念发生了变化。可是我们的大学这些年来进步不大，水平不见得提升，反而变得更加功利。中国经济这二三十年有飞速的发展，可是我们大学所培养的在科技方面顶尖的人才，是极少的，人文社科方面那就更惨，在国际上没有什么话语权。现在不是提倡文化战略吗，国家希望文化的软实力增强，可是大学这种状态，并不适合当文化建设的推手。

我们对“钱学森之问”，还是没有交出认真的答案。

所以我们应当反思几十年来高等教育之弊，要寻找和重新确定大学的定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工具性的思维。大学当然要服务社会，要培养人才，这是大学的任务。但办大学不能直奔主题，不能只是想着培训人才。大学的定位要高一点，要充分考虑大学的功能。如果就定位在服务当前社会培养人才，那大学的功能就被缩小了。

办大学主要是为什么？是给社会提供一个精神的高地、文化的源泉，在这个前提下，形成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然后培养人才，从事科学研究等，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证明，办大学只想着思想灌输和技术传授，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既培养不了杰出的人才，也不可能和世界上一流的大学竞争。这里不是纠缠“大学是什么”的概念之争，也不是预设某一种大学的“本质”，而是因为事实上我们的大学存在很多问题，即使在人才培养上也不太成功，所以要从根本上反思，思考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应当怎样定位？

其实大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很多有名的大学，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才最后成为科学文化的中心，成为精神的高地。所有著名的大学对于社会都有文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是因为既关注社会，又能适当超越，和社会现实生活保持一些距离，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学不能和社会混同，应当有理想，有批判精神，有自由的空气，创新的氛围。大学应当比社会“干净”一些，是社会的特区，是文化建设的实验场。大学集中了一批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而不只是专业技术。大学的精神不是用习俗或道德来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源源不断的追求来支撑。自由的思想探索、批判的意识、学术的切磋、独到的发现、大胆的创新、个性的充分发展，都是大学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大学文化向社会辐射，能成为社会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成熟的大学对社会有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不应当满足于服务当前，迎合时尚，不应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在大学特有的文化氛围中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发掘他们的潜力，这和我们通常讲的专业训练是有差别的。

爱因斯坦说，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都是讲“人”，我理解是大写的“人”，而不是一般说的“人才”或者“专家”，这和我们通常对于大学功能的认识是很不同的。

（摘选自《燕园困学记》，有删节）



评论鲁迅、胡适等文化名人 王元化遗作《人物小记》问世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遗作《人物小记》近日出版。本书系王元化先生自编作品集之一，收入作者评论鲁迅、胡适等现代思想文化大家及记述熊十力、顾准、孙冶方、王瑶等同代文化名家人生、事迹的文章二十篇。

王元化生前对当代中国诸多重大思想与学术问题均发表过独到的论述，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思想界有“南王北李”和“南王北钱”的说法，“王”都指王元化先生，“李”指李慎之先生，“钱”指钱锺书先生。王元化的《文学沉思录》《传统与反传统》《清华园夜读》《思辨随笔》等著作，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

王元化常说自已是“五四的儿子”，坚持对“五四”的重新思考，他的思考涉及文化传统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中西思想比较问题、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说，王元化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把“五四”精神看做是自己的生命，但他在晚年的时侯对“五四”和中国革命都有深刻的反思，试图寻找“五四”和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王先生是一个反思性特别强的人，这与有些学者不一样，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选择是否经得起理性的追问。”

在《人物小记》中的《谈鲁迅小集》一文中，王元化说，像鲁迅这样在“五四”中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思想后来也有曲折的发展过程，有一段时期也说自己是遵命文学。但王元化指出，鲁迅的遵命不是遵奉统治者、权势者、压迫者的命令，“和那些奴颜媚骨的投机家有着根本区别，显示了一贯的正直与骨气”。从中可见王元化一贯追求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在王元化看来，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往往是那些饱经忧患之士，所以，他愿意记下他所景仰的文化先贤和卓越的同代人，记下他们的学问和思想，记下他们遭受的磨难与探索的艰辛。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夏中义在一场纪念王元化的活动中说，晚年的王元化对自己幼年生活过的清华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眷恋，还能清楚记得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居所，“和王先生精神源头联系在一起的是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在许纪霖看来，王元化认同清华，和那种校友或子弟式的母校崇拜有很大的不同，王元化对清华的认同是纯粹精神性的，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是他所理解的清华灵魂所在。王元化奉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信条，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喜欢简单地归为某个类。

王元化曾感慨：“王国维和陈寅恪的二十世纪可以传下去的学者。那是大学者，我们这种是不能比的。我感觉很悲哀，中国传统的東西一代不如一代，我不行，国学、西学的学养都不够，已经差很远了，不是差一点点了。我的学生跟我又有一点距离了，学生的学生成又有距离了。真正要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是要花很多力气的。”当年学者上电视讲经典引起广泛争议，在《人物小记》一书中，王元化说，大众文化是需要的，但是要继承而不是破坏传统中的人文价值。“我们不能为了消费，为了取媚观众，把已有的好东西全部牺牲掉。”

许纪霖表示，王元化晚年最焦虑的，是中国的文化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大危机。他很担心从轴心时代以来积累的人类文明将要毁在我们这一代，文明中的精英传统在急剧失落，而流行的都是一些低俗的、民粹的文化。许纪霖记得，王元化在晚年的时侯一再感叹“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学者吴琦在《王元化谈话录》一书的前言里也说，王元化的晚年是孤独而悲观的，“一向崇尚19世纪人文精神的王元化先生，当看到当今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横行下的社会，亲情和友情在物欲下的淡漠，职业道德和人文底线渐趋消退，悲观笼罩着他的整个心灵。”



《人物小记》
王元化 著
东方出版中心